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〇二期 ——  
(二〇〇七年十月八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710a)

---

|  |     |
|--|-----|
| 【本刊专稿】周恩来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 袁笠翁 |
| 【人物访谈】1967年叶群和江青的关系<br>——江青第一任秘书阎长贵访谈录 | 舒云  |
| 【亲历文革】制止武斗亲历记                          | 苏自林 |
| 【往事如烟】目睹文革揪出田汉、贺敬之一幕                   | 准星  |
| 【读史札记】林彪研究最新成果：《林彪案件完整调查》              | 武宜三 |
| 【追忆前辈】感受长者关怀，愧对前辈期待——纪念王年一先生           | 陈小雅 |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本刊专稿】

### 周恩来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 袁笠翁 •

关于周恩来对于文革的发动知不知情，官方的说法是说周恩来不知情，周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缺乏思想准备，对毛主席发动这场“革命”的深层想法不太清楚，周恩来是被动的卷入这场狂风暴雨之中的。(1)事情果真如此嘛？事实上周恩来从罗瑞卿事件就开始涉入，并非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不知情，反而是积极的向毛泽东表态，全力支持文化大革命。

1965年11月30日，在林彪给毛泽东写的那封信中说：“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而正是周恩来告诉林彪关于毛泽东决定整杨尚昆。(2)在11月1号，杨尚昆到西华厅同周恩来谈话。杨尚昆对周恩来说：“许多事情你都了解，有些问题只有你知道，也有些事情你不了解……照目前事态发展下去，

可能将来要处分我，甚至开除我的党籍。”周恩来说：“不至如此，你放心。”〔3〕根据王力的回忆，毛泽东在65年夏天就当着周恩来的面痛骂杨尚昆，并责问杨尚昆为什么还不走。〔4〕在杨尚昆同周恩来谈完之后，在12月10号离京到广州。

在上海会议召开过程中，周恩来亲自布置机组人员携带武器把罗瑞卿“押送”到上海，防止罗瑞卿叛逃。〔5〕周恩来告诉吴法宪要严格保密罗瑞卿到上海的事情。吴法宪告诉周恩来罗瑞卿曾经打电话到北京找吴法宪，周恩来告诉吴法宪不要接罗瑞卿的电话。这个时候彭真正好打电话来找吴法宪，周恩来阻止吴法宪去接电话，并告诉吴，不要接，就说找不到你，彭真可能是来了解会议情况的。吴法宪表示对此很不理解。〔6〕可见从杨尚昆到罗瑞卿，再到后来的彭真，周恩来都是知情的，并且在上海会议期间对彭真采取了封锁措施。1965年12月15日上海会议结束当晚，在锦江饭店举行了文艺晚会，在演出的中间还安排了舞会。舞会当中，周恩来忽然提议叶剑英给大家唱评弹，实际上当时许多干部都非常紧张，周恩来却难得有如此兴致让广东人叶剑英唱评弹！周恩来用这种特殊的形式表示对毛泽东整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也为原来受过罗瑞卿的气而感到舒心开怀。〔7〕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同康生连续三次谈话。毛泽东严厉批评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并表示：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毛泽东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评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如果继续这样下去，要中宣部解散，北京市委解散。康生后来在5月5号和6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表示毛泽东的这三次讲话贯穿一个中心问题：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现在已经出了，彭罗陆杨，田家英、邓拓、廖末沙都是，向中央进攻，要进行文化大革命。

3月31号，康生奉毛泽东之命回到北京并且当日将三次谈话纪要给周恩来彭真看并汇报四个小时。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周恩来不仅正式写报告给毛泽东，用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及为贯彻落实毛的指示而准备采取的措施。报告中说：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旗，彻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动学术思想，彻底揭露这些学术权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严格看待这是夺取文化战线上领导权的问题，以利兴无灭资，组织自己队伍，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斗争。并拟按此方针，起草一个中央通知，送主席审阅。同时，指出前送主席审阅的五人小组报告（即“二月提纲”——作者注）是错误的，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或者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同时，周恩来特意用打电报的方式告诉毛泽东以示郑重，表示对毛泽东给以坚决的支持。〔8〕

而就在不久之前，1966年3月中旬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想在这次会议上以搞“独立王国”的罪名，一举解决彭真的问题，打掉刘少奇在政治上的左膀右臂，但在常委内部试探了周恩来、邓小平的态度后，却得不到两人积极的响应。〔9〕但是仅过半个月。周恩来却私下背地里抛开其他常委做如此表示，后果动机可谓非常恶劣。

在中央常委中，周恩来示第一个作如此表示，以示忠心。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中打开了第一个缺口。陈云曾经对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为什么发生如此表示过：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10〕而周恩来则是向毛泽东臣服的第一干将，离开中央集体率先表示同意错误意见，因此对于文革的发动，周恩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远远不是仅仅用被动的卷入，说了几句违心的话那么简单。周恩来做的不仅单纯表示向毛泽东效忠，而且变本加厉，拿出实际行动来拥护对毛泽东的支持。

4月10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6〕211号文件批转《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

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批语说这个纪要很好，很重要…不仅适合军队，还适合地方。4月16日，周恩来认为此批语一般化，对纪要的评价不够。陈亚丁根据周恩来的口述重新起草了个批语。江青找刘志坚、张春桥、陈亚丁做了推敲修改，22日刘志坚送周恩来审定。5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废止211号通知，10日用新批语代替，但是时间仍落款为4月10日。新批语相对与旧的，着重增加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重要性，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文艺思想指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方向”等重要内容。（11）

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周恩来指出彭真的“路线”是错误的，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12）1966年4月16日周恩来参加了毛泽东在杭州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集中批判了彭真。周恩来并且代表中央同彭真谈话三次，指出其所犯错误。（13）毛泽东敢于趁刘少奇出国访问之际拿彭真开刀，这同周恩来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5月1号，周恩来在欢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的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14）

在随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鉴于毛泽东多次谈到要防止反革命政变，周恩来建议林彪做一个关于政变的讲话，这就是林彪说：“常委的其他同志要我先讲”的由来。（15）戚本禹在论及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过程时说，这次会议，名义上是刘少奇主持，实际上，起核心作用的是周恩来，笔者认为周恩来比刘少奇更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在林彪讲话之后的第三天，周恩来在5月21号着重讲了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16）其实，周恩来不仅大讲特讲防止反革命政变，还大力吹捧林彪，号召全党群众要紧跟毛泽东毛泽东走，为党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个以毛泽东是非为是非的做法，试问周恩来的党性跑到何处，这与做毛奴又有何二样？

周恩来开宗明义的讲，“同意许多同志的讲话。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的很好”。……。“什么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坏处是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各方面窃取了领导地位，夺取了领导权。可以看出产生修正主义国内原因是主要的。”“林彪同志讲的亚非拉地区六十一次政变，也可以看出国内因素是主要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就讲了‘糖衣炮弹’，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就讲得更明确了。一九六三年四清至现在发现基层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可以看到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时期，修正主义可以成为当权派。”……“（笔者注，周恩来在此很批彭、罗、陆、杨）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我们的三防与陆定一的三防不一样。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中央与地方与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一种是搞政变。搞资本主义复辟，然后再推翻……。彭、罗的问题可以发到县、团讨论，以后逐步深入到群众中去的。”

引人注目的是，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在5月5号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时谈到发动和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所采取之策——“剥笋”政策。毛泽东说：…。那些旧人有一部分钻到党内来，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等于赫鲁晓夫潜伏不动，待机而起一样。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四十五年了，我们就初步地剥了一遍，剥掉了不少反动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张闻天、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罗瑞卿、彭真等等前后几十个中央委员，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周恩来讲：“另一种是不断地清除修正主义，‘剥笋’不断出现，不断清除。出是肯定的，出来后可采取剥笋的政策，这样可以避免修正主义复辟，这就是我党当年对国民党的政策。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分成左、中、右派，中间的转化为右派的剥笋，但并未实现这个政策。现在用到无产阶级专政直到共产主义实现，这是发展规律。如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是高饶事件。二次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事件，‘四大家族’是第三次了（笔者注——这是党内第一次把彭罗陆杨作为一个反革命集体对待），对他们都是采取剥笋政策，修正主义不可能得逞，使我们国家不出修正主义。主席说：‘他们得支气管炎，吃五十片药就消灭了细菌’。事情是两种可能，或者我们被他们打倒，或者我们剥掉他们。一种是得逞，一种是剥掉。想一想，不采取剥笋政策，不剥掉，不清除，我们的国家、党不知怎么样了。前后三次事件都是结合起来的，彭和高都是个人利害冲突，不清除他们，他们的阵地会越来越大，这是很危险的。揭开‘四大家族’，夺回他们所占领的阵地是剥削政策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应该庆祝。现在世界上有些国家好象风平浪静，不采取剥笋政策，‘死水一潭’是不成的，修正主义搞政变，基础是一文一武，掌握笔杆子、枪杆子，两个都占领了就动手，但最重要的是党权，彭是大党阀。防止修正主义窃取我们的党权，防止修正主义的重点要放在上边、中央、党内、国内。”“林彪同志讲的那一段历史，一方面要记住政变之多，另一方面要相信北京出了政变总会有党、国、领导军队造（反）革命反的人，要有信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坚持不懈地采取剥笋政策，世代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彭（真）是高山倒马桶……，从最近二十三条下达后，彭打出反左的旗号，完全取消四清的一条黑线，不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此外，周恩来在这里大力褒扬林彪。周恩来：“……‘三家村’、‘前线’反党反社会主义出现在这个时期，他们采取相同的立场、思想、主张、目标是向党向社会主义地起进攻，进攻的目标是林彪同志，针对毛主席，首先砍掉毛主席的左右手，这不是偶然的，不是巧合，罗是大比武出现的，陆是夫妻老婆店发现的，他们的共同点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在这个时期他们出来反对林彪同志，因为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的最活，做得最力。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林彪的讲话是最有分量的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提出了活学活用，四个第一，……‘四大家族’原形毕露，事情不简单，斗争刚开始。我们的阵地一个一个地被夺走了，现在要一个个地夺回来。他们打着红旗，散布了大量毒素，他们是见不了天日的，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交给群众。……彭、罗、陆摆出一付一贯正确的姿态（彭说他既非教条主义，又非经验主义），骄傲自满，自高自大，从无自我批评，同主席和林彪同志从不谈东北的问题，个人主义胜过党性，对他提过意见的人，他恨之入骨，永远不忘。”

最后，周恩来告诫全党：“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象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讲话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毛主席的一家，毛泽民、毛泽覃，毛主席的爱人杨开慧烈士，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这才是领袖的家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学毛著，作笔记要和自己的革命历史联系起来，作总结，有的人摆样子，不读毛著，拿起来读一段就痛心了。要返回来读三十本书。”

“晚节不忠，一笔勾销”，也就是说顺毛者生，逆毛者亡。正如聂元梓在访谈中表示：毛泽东从沙发上起来，他赶紧去搀扶。有这个必要吗？不是有下面的人吗？你超过了你的身份了嘛。

毛泽东看什么图，周恩来跪在地上给毛泽东讲解。说明他还有奴才的本质。不仅去扶毛泽东，而且江青下楼，周恩来都趋步往前，扶其下楼！可见，周恩来不仅死心塌地的做毛奴，而且爱屋及乌，做江奴亦心甘！（17）（吴法宪回忆到，周恩来带黄永胜和吴法宪等人前去找江开团结之会，周恩来要黄等人在楼下等候。江青一开门，周恩来赶紧上前扶江青下楼。）那么无论毛泽东如何非法妄为，周恩来都是要恶毛之所恶、打毛之欲打，是名副其实的毛泽东的第一打手，文革的第一帮凶。无论是从建国时期的高饶事件，还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关于彭德怀所受的迫害同周恩来的关系，可参阅拙著：《周恩来与彭德怀在1967年受到的迫害》），到文革初期的彭罗陆杨，文革中的迫害刘少奇一案，杨余傅事件，贺龙之死，文革中所有被专案组迫害的成千上万的人，周恩来都是身体力行的执行毛泽东的旨意，忠实的充当了第一打手角色。在执行过程中，从来没有提过异议，这说明周恩来是非常心甘情愿的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并以此向毛泽东表示“忠毛到死”，迫害别人则成为自己可以获得死后不被鞭尸，脸上不会被画叉叉的必要行动了，也可以称得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当516通知发布之后，周恩来在6月底访问阿尔巴尼亚。周恩来在周恩来在1966年6月27日在地拉那群众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目前，我国的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粉碎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篡夺党和国家领导的阴谋。这是一场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斗争，将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包括在文化领域内的专政。我国广大人民，正在彻底破除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18）虽然陈伯达修改和审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6月1号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但是陈伯达再也没有公开表示过如此意见，但是周恩来除了在地拉那表示支持，而且在随后的几个月内多次表示要横扫牛鬼蛇神！两次公开表示赞同陈伯达的意见。（19）

1966年，毛泽东要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指导文革。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陈伯达担任组长，提议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担任第一副组长。（20）当毛泽东在8月4号下午和刘少奇刀剑相见之后，决定换马。周恩来对毛泽东提携林彪的想法心领神会，积极推荐林彪成为党内排名第二的领导人。根据吴法宪的回忆录，当时的副主席名单是林周二人，但是周恩来把自己的名字勾掉，以突出林彪的副统帅和接班人地位。在以后的文革岁月里，周恩来多次公开自豪地提及这件事，说林彪“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周恩来而且可以不顾历史的真实，公开篡改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合的历史，把中共南昌暴动中只是连长的林彪说成是率领部队和毛泽东会师的领导人。他说：“林彪同志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

但是林彪知道接班人是“烫手山药”，极其勉强为难。根据吴法宪的回忆，当林彪到达北京时候，是周恩来和汪东兴上飞机同林彪谈话，力劝林彪。但是当毛泽东对林彪说：“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应该有个登台演说才好啊！”但是林彪知道这是毛泽东要他表态，攻击刘少奇等，林彪以不明就里为由推辞不干。周恩来表示可以找别人代写。于是周恩来找雷英夫谈话，要其为林彪准备讲稿。（21）

综上所述，周恩来对于文革的发动，并不是不知情，而是对于毛泽东的部署率先带头表示支持，坚决支持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由于周恩来自身的地位，“晚节不忠，一笔勾销”的观点，对于位数不少的干部无疑敲响了警钟，只有顺从毛泽东的旨意，不可违背，从而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创造消除了重大阻力。（22）周恩来非常善于揣摩毛泽东的想法，而且以毛泽东的喜好做为自己行为的准则，成为文革第一帮凶则是历史的必然！

注释：

- (1) 力平 《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 第3页; 刘武生 《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人民出版社 2006版;
- (2) Frederick C. Teiwes Sun Warren 《The Tragedy of Lin Biao》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 (3) 刘明钢 《杨尚昆与周恩来: 相识相知50年》《党史纵横》 2003年第4期
- (4) 王力 《王力反思录》
- (5) 康庭梓 《专机师唯一一次带枪执行任务》; 吴法宪 《吴法宪回忆录》
- (6) 吴法宪回忆录
- (7) 张佐良, “公安部长罗瑞卿被逼跳楼致残 被人放入箩筐游斗”; 佟言 《党史博采》(纪实版) 《陈泊: 被毛泽东誉为“福尔摩斯”的情报奇才》 2006年第10期 (周恩来在建国之初过问两陈的案件但是罗瑞卿根本不理周恩来, 而且还出言不逊)
- (8) 程前 《文革漫谈》 哈佛 费正清图书馆 第158—165页; 高文谦 《晚年周恩来》
- (9) 高文谦 《晚年周恩来》 高文谦访问彭真秘书项淳一谈话记录, 1984年1月6日
- (10) 《陈云文选》 第246页
- (11) 程前 《文革漫谈》 哈佛 费正清图书馆 第158—165页
- (12) 《天翻地覆慨而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2) 1967年10月7号 《东方红报》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
- (14) 《天翻地覆慨而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2) 1967年10月7号 《东方红报》
- (15) 余汝信 《与戚本禹面对面》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页32
- (17) 《文革女将聂元梓谈周恩来》, 吴法宪 《吴法宪回忆录》
- (18) 1966年6月29日《人民日报》第三版
- (19) 关于周恩来的讲话, 可以参阅宋永毅编写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程前 《文革漫谈》 存于哈佛费正清图书馆手稿 第5篇 《三个搞不通》
- (20) 李肃 《回首文革》
- (21) Macfarquhar, Roderick 《Mao's Last Revoluti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22) 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就特别强调周所提出的保持晚节的重要性, 说: “保证不打自己的旗帜, 这是最根本的一条。这样就是在一些路线性质的问题上犯了错误, 我们也比较容易改正。这一点, 恩来同志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他不断地讲(周恩来插话: 也还要警惕。), 人人都要警惕。只要不搞个人野心, 不搞个人主义, 不打自己的旗帜, 我看总可以跌倒了爬起来, 慢慢地跟上。” 1966年5月25日。

~~~~~

## 【人物访谈】

1967年叶群和江青的关系  
——江青第一任秘书阎长贵访谈录

• 舒 云 •

叶群和江青的关系及其事迹近年来披露了不少，但1967年叶群和江青的关系及其事迹还有一些是鲜为人知的。那时江青“众星捧月”、大红大紫，正处于大权在握并且还要继续向上攀升的时期，叶群拼命巴结她，这和后来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关于这个问题，江青的第一任秘书阎长贵先生向我谈了一些他亲自看到和经历的情况。

1966年6月，阎长贵被戚本禹从《红旗》杂志社调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做处理群众来信和来访工作，一个月后又被调到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住进钓鱼台，从8月份起戚本禹开始让他处理江青的群众来信。阎长贵出身贫下中农，社会关系和经历都很简单。1961年他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师从中国哲学史家关锋研究中国哲学史。1962年9月22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他根据华君武的漫画《无题》写的文章《永不走路，永不摔跤》。这是阎长贵的处女作。这篇短文发表后，阎长贵被邀请参加座谈会，有人著文评论这篇短文的内容和逻辑，有新闻系的学生为写毕业论文登门造访，还作为范文收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辑的教学用书《报刊评论选》，很热闹了一番，搞得阎长贵晕头转向，不知就里。当时没有人告诉他其中原因。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戚本禹手下工作时，戚才告诉他毛主席表扬过他写的《永不走路，永不摔跤》，这就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批发了阎的文章。其批语为：“印发各同志（按：指参加这次中央全会的同志）研究。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毛泽东九月二十四日”。这件事对阎长贵在文革中被选作江青的秘书恐怕有很大关系。

“文革”前江青没有秘书，她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后，管的和需要处理的事情多了，急需秘书帮助。1966年底的一天，在钓鱼台的院子里溜弯时，戚本禹跟阎长贵说：“江青同志要我去给她当秘书，我太粗，不行，你还比较细，我推荐你去。”当时，阎长贵以为只是说说而已，没怎么往心里去。可是就在这次谈话不久，大概十多天吧，戚本禹就把阎长贵带到或者说送到江青住的钓鱼台十一楼去了。从1967年1月9日，阎长贵正式成为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毋须说，阎长贵被选作江青的秘书，其过程决不是这样简单。阎长贵说，这个过程的具体情况他至今也不完全清楚。有人说，给林彪选秘书就像过去选“状元”一样，无疑给江青选秘书也不会容易。阎长贵说，当时听说有三四个候选人，我是年龄最轻的（不满三十岁），资历最浅的，结果我被选中了，个中原因不得其详。后来，江青跟我说：“你还有点劳动人民的味道，还没被化掉。”“没被化掉”，指没被资产阶级“化掉”，应该说，在当时，这是很高的政治评价。这可能是重要原因，还有什么就说不清了。

阎长贵作为江青的秘书，在江青身边工作，见证了许多高级人物和江青的关系。这次他特别谈了林彪、叶群和江青的关系，其中有许多人们还不知道的情况和情节。

阎长贵说，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毛泽东树为接班人，成为中共中央的唯一副主席。林彪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以他的名义，送给江青和江青身边工作人员每人一套军装。1966年8月18日，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头一天深夜，毛泽东突然要穿军装。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需要军队支持和依靠军队这个柱石。毛泽东穿军装，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主要的意思就是要提高军队的地位。建国后毛泽东就没有穿过军装，由于他身材高大，他要穿军装，就要穿特制的，一时上哪里找？正好8341部队有个警卫干部身高体胖，把他的一套新军装拿来，虽然有些紧，总算凑合了。以后有好多写信，为什么不给领袖准备一套合适的军装？！毛泽东穿军装反响非常，穿军装在文革中成为时尚。有军籍的人，没有军籍的人，从总理起，许多人都穿起了军装；当时不仅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连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不论做记者的，还是外出办事的，都穿军装，人人以穿军装为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林彪送给江青及其身边工作人员每人一套军装。而这究竟是林彪的主意，还是叶群的主意？阎长贵说，这很可能是叶群打着林彪的旗号和以林彪的名义做的事情。叶群慷国家之慨做这件事，其用心和用意很明显，就是讨好江青，包括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阎长贵

说，他1967年到江青身边，还有人领他到军需处根据他身体尺寸补发了一套军装。就这件事阎长贵在文革后还问过汪东兴：“林彪是否也送给了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汪断然说：“没，只送给你们江青身边工作人员！不仅送了陆军军装，后来还送了空军军装和海军军装。”阎长贵笑着说，他没有当过兵，不懂军队礼仪，穿上军装既觉得光荣又感到别扭，走过中南海、钓鱼台的门口，站岗的战士两腿一并举手敬礼，吓他一跳，不知道怎么应付。

江青表现得很有军队“情结”，她把演“样板戏”的北京京剧团也纳入军队编制，其演员都穿上了军装。这样以来，弄得很多剧团纷纷要求参军，也希望穿军装。江青在1967年11月9日和12日召集的北京文艺座谈会上讲说：“关于参军的问题，你们不要着急。”红卫兵，特别是初期的中学红卫兵，也多穿军装——没有领章、帽徽的旧军装。穿军装，像佩戴毛主席像章一样，也是文革中的一道重要风景线。

1967年春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翻印了人们出版社出版的第一个横排本的《毛泽东选集》。阎长贵说，书刚出来，叶群就急急忙忙拿来送给江青及其身边工作人员每人一套，并拿腔使调地说：“这是林副主席送的！”林彪在送给江青的那一套上签了名，送给工作人员的没签名。守着江青，我代表工作人员真诚地向叶群表示：请叶群同志转达我们对林副主席的感谢，我们一定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认真学好林副主席送给我们的毛主席的书，努力做好为江青同志服务的工作。叶群说，林副主席送给你们毛主席的书也是这个意思，并亲热地和我握了握手。说实话，当时接到林彪送的书，的确很高兴，也觉得很光荣。我恭恭敬敬地在这套《毛泽东选集》的扉页上写道：这是林副主席惠赠的书，一定要好好学习。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不料，我1968年1月遭江青诬陷被投入秦城监狱时，狱卒一定要我把这页撕掉，我还很心疼。阎长贵很决断地说，这次送书虽然打着林彪的旗号，用林彪的名义，恐怕也是叶群的主意。

林彪和叶群到钓鱼台11楼江青看望江青，可能不止一次。阎长贵说，我只见过一次，这就是1967年春天。林彪来了坐在会议室里，板着脸，一句话也不说。工作人员都知道，他来了不用上水，因为他一般不喝水。毛泽东用大大小小的宣纸给江青写过好多字，江青拿着毛泽东写的几幅字下楼来，转送林彪。江青说：“这几幅送林副主席，还有几幅送老夫子（指陈伯达）。”林彪话很少，脸上也没有什么表情，看不出他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叶群说：“我们是一介武夫……”，表示很感谢江青。至于这次他们究竟还谈了些什么我就知道了。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叶群曾跟秘书们说：“反正我认准了一条：首先要紧跟主席，我要紧跟江青！今后她走到哪我跟到哪，她不去的地方我也不去！”阎长贵说：“张云生同志回忆得很对，叶群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确实处处学江青、跟江青，对这一点我有多次的经历和体会。”

江青在大会上讲话，或接见红卫兵以及其他群众时，几乎没有一次不说：“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或者说：“毛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叶群在接见红卫兵和群众时也鹦鹉学舌式地说：“我代表林副主席来看望大家！”“林副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云云。在许多群众场合叶群经常带头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文革中接见红卫兵的会议很多，还不断有“样板戏”的演出。阎长贵说，叶群经常给他打电话，问：“今天的会议或演出江青同志去不去？”我就反问她：“您去不去？”叶群清脆地回答：“江青同志去我就去！”类似的电话很多，我都如实地做了回答，因为她所问，一般我都知道江青去不去；如果我不知道，我会在问过江青后，再打电话告诉她。对她的电话我还是认真对待的。很多材料披露的一件事情，也表明第二夫人叶群对第一夫人江青一唱一和，亦步亦趋，如影随形。1967年国庆节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去首都机场迎接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



谢胡为首的党和国家代表团。叶群早早去了，客人都要来了，叶群看江青没来非要走，周总理不让她走，她还是设法悄悄离开了。叶群回到毛家湾，洋洋得意地跟工作人员说：“总理说我走不得，他考虑的是外交，但我考虑的是政治。总理对江不出场并不在意，但我抛开江青而独自在那里显示，这对她不是一种不尊重吗？我对总理说，江青来，我们两个都是妇女，我才不感到孤单；她不来，就我一个女性，多么孤单哪！总理板了板面孔，不高兴地说：‘这成什么理由？你既然来了，不能走！’我见和总理正式请假是脱不开身了，就趁后来总理没注意，偷偷地溜了！”——这件事情很典型，再清楚不过地反映了叶群对江青态度的心理。

叶群经常送江青一些东西。阎场贵说，当时毛主席像章种类繁多，花样翻新，叶群搞到新品种，就要给江青及其身边工作人员送来。1967年夏天，在北京还不到吃西瓜季节，叶群让林立果给江青送来几个南方西瓜。那一次我对林立果印象很好。他二十多岁，小我七、八岁，坐在我办公室里，显得很老实。话不多，问他一句，说一句。后来，即“九一三事件”后，我在秦城监狱里，看到批林彪的文章，说林立果是什么“超天才”，干了这样或那样的坏事，我很感慨，觉得：“人真是不可貌相！”还有一次江青让我到毛家湾给林彪送一个什么文件，在我坐在会议室里等候回音时，叶群拿出五六支圆珠笔交给我，嘱我给江青两支，其余的留给我和工作人员用。在当时，圆珠笔在中国还是新事物，市面上很难买到。上面几件事情看来都很小，却也反映了叶群的良苦用心。

叶群对江青的生活很关心。阎场贵说，叶群还经常给他打电话，问：“江青同志想吃什么东西？你们那里搞不到的话，我们这里有办法。”我对这样的电话很反感，不满意。我心想，江青想吃什么东西搞不到？她有专门的生活管理员。不过，对这种电话我都“贪污”了，没向江青报告过，我觉得这太俗了，江青知道了也不一定满意。这大概反映了我这个小知识分子的清高心理。说到江青的生活，她在一次散步时跟我说：现在孩子都大了，都工作了，我和主席的工资，除了吃饭、穿衣，没有别的用场。即便这样，我们也不吃山珍海味。她让我告诉汪东兴同志注意这个问题。说实话，就吃饭来讲，江青说不上多么奢华。但她在吃饭问题上，比较难侍候也是出名的。她住在钓鱼台，不论到中南海开会，还是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她都经常带着他的厨师程汝明师傅；如果程师傅没去的话，中南海或人民大会堂为会议服务的师傅们关于江青的口味就要打电话询问程师傅，——也正因为这样程师傅得了一个他当时还不解其意的雅号：“遥控”。在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中能够善始善终的大概只有程师傅一个人，程师傅在毛主席身边工作20多年，直接给江青做饭十多年（从1961—1976），甚至从1973年起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名担任了江青身边工作人员的支部书记（在中央负责人的工作人员中，厨师担任支部书记的，这大概也是绝无仅有！）。江青从来不敢为难和欺负程师傅，这也反映了她的实用主义！因为只有程师傅做的饭，合她的口味，爱吃。秘书、护士，可以换，好找，但合意的厨师难觅，这大概是江青的想法，因此她对不合她意的秘书、护士，总往死里整。据林彪的秘书们说，叶群对工作人员一般说来还可以，虽然也作威作福，但从没有把工作人员关进监狱，这一点和江青有不同。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阎长贵说，这就是，叶群对我们即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很热情，很关心。不仅如上所说，她不断送我们毛主席像章等东西，还经常嘱咐我们好好为江青同志服务。特别使我铭记不忘的，就是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我因为什么事情耽误，江青已经走了，我没车回钓鱼台。叶群知道了这件事情，热情地对我说：“没关系，用我的车送你回去。”我坐叶群的车回到钓鱼台。这使我对叶群的好感顿增，十分感谢她。

阎长贵说，当时江青在我脑子里是一尊“偶像”，拿叶群和江青比较，总觉得叶群不修边幅，有些猥琐，和江青不是一个档次。而后来从张云生、吴法宪等人写的回忆录中看到她工于心计，能控制林彪，能当林彪的家，我当时一点也不了解。同时，我对江青和叶群合伙干的一些坏事，如抄上海赵丹、郑君里等文艺工作者的家，迫害孙维世致死，也丝毫不知道。应该说，196

7 年江青和林彪、叶群的关系还处于比较好的蜜月时期，有分歧和矛盾，但还没有激化和公开暴露出来。所以，在我给江青当秘书的 1967 年，我没听到江青说林彪、叶群的什么坏话，她也没告诉我和叶群（以及林彪）接触，包括打电话，要注意什么。据江青的第二任秘书杨银录说，江青对他就做过这样的布置：“叶群这个人很有心计，她打来电话，和给她打电话，都要做记录，以留作备用和证明。”这就是说，江青和林彪、叶群的关系也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

□ 《文史精萃》2007 年 7 期 第 54—57 页

~~~~~

## 【亲历文革】

### 制止武斗亲历记

• 苏自林 •

人的一生有很多的经历，有的经历一闪而过，有的却成为印象深刻的记忆。自 1966 年夏席卷全国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我和我的战友们却因执行特殊任务远离祖国，没有参加；对大字报、大批判、大串联、批斗会以及“文攻武卫”甚至连“武斗”这些新名词，都感到非常陌生。然而，我们奉命回国后，在玉溪休整时遇到的一件事——制止的一场武斗，使我感受到文革期间“造反派”的极端与群众运动的狂热以及两派之间所谓的“阶级阵线”的分明。那种场面是我随部队援越 3 年与之后在老挝期间从未经历过的？熏也是一段真实的毫无修饰的记忆。

1968 年 8 月 16 日，我所在的援越抗美部队 5 支队，在越南胜利完成了 7 号公路、11 号公路修建任务交接之后，全体指战员奉命凯旋回国。经过 3 年的越战生活，回到祖国的喜悦心情是无法形容的。

我们乘坐的汽车顺利地到达中国河口边防检查站时，受到云南省、河口县党政军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由衷地祝贺我们圆满完成了援越抗美的重要使命，热烈欢庆我部指战员凯旋。

从越南回国后，我部已受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命令，组建援老抗美部队，部队的名称也由援越抗美部队 5 支队改为“中国援老抗美筑路指挥部”。我们奉命回国是进行扩编和休整的。

部队进驻玉溪进行休整期间，受到云南省党政军和当地群众组织的各种形式的慰问。在将近半个多月的时间里，部队的活动安排得满满的，既要接待各地、各级党政机关的慰问，观看各种文艺团体的表演，又要组织汇报、演讲、交流。中央慰问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王耀南将军的率领下，带着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关怀，专程前往玉溪慰问越战前线归来的 5 支队全体官兵。我作为支队政治部新闻资料摄影员，带着相机跟随慰问团下基层看望指战员，到医院慰问“挂彩”的伤病员。

部队在玉溪休整期间，进行了援越抗美 3 年来的总结表彰。在“援越抗美表忠大会”（“表忠”是文革特定时期的提法，实际上是援越抗美“立功受奖”表彰大会），我和政治部文化科徐文富干事（我摄影的启蒙老师）为支队首长以及立功受奖英雄模范人物拍摄了很多照片。当时，摄影并不像现在这么普及，照相机是稀缺的高档次宣传工具，一般人很难买得起，业余摄影爱好者并不多，专职摄影的人员就更少。我们援越抗美部队 5 支队以及随后扩编的援老抗美部队，都相当于军级以上机构，也只有我们两个专职摄影（我从文工队调任专职摄影后，徐干事因负责更多更重要的工作，摄影已变成兼职了），担负着整个部队施工、作战、友谊、文化等新闻资

料的摄影任务。这次大会拍照工作义不容辞地落在我们肩上，台上台下忙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一个载入史册的大型表彰活动以及随后到各部队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慰问和英模报告会、形势报告会，我们是不敢怠慢大意的，这样好的新闻资料一旦疏忽就无法弥补；另一方面，是有条不紊地做好出国老挝的各种准备工作，尤其是部队的思想工作，需要进一步教育、动员和整顿。这与3年前出兵越南的激情有些不同了。

部队的文化生活由我们政治部文化科总管，除了指导下属单位文化工作外，还领导着一支演唱水平比较高的文工队，长年深入基层慰问演出。为了充实文工队的力量，指挥部决定在玉溪特招了地方剧团的几名女演员。这几名女演员年轻漂亮，说唱全面，科班出身，基本功扎实，使部队清一色男性文工队员的成分中增加了“花色品种”，为奔赴老挝开展战地文艺宣传扩大了演员阵容，方便了老挝多民族国家舞蹈节目的编排。这些女孩成为军人并作为文艺兵出国参加援老抗美，走遍老挝的山山水水，经历各种磨炼，接受战争的洗礼与考验，对她们来说也是一生中难逢的机会、永久的记忆。在援越抗美战场，我们亲身经历了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残酷较量，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

当时武斗在国内一些地方正在进行，有的地区还相当激烈。我们这些刚刚回国的官兵，对此百思不得其解——阶级兄弟怎么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敌我双方？在玉溪休整期间我们制止了当地的两大派进行的一场武斗，这使我看到“文化大革命”中被挑动、被利用的群众，在所谓的“阶级阵线与大是大非”面前，如何人为地制造派别，如何对待自己的同志，如何当面编造谎言，如何指责污辱对立的一方。

“文化大革命”到了那个阶段，国内穿军装的解放军特别是军分区、武装部的官兵的威信，在群众中已经打折扣了。唯有我们穿灰色制服的出国部队指战员，在云南人民心目中威信很高：一是没有参加过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在国外执行军事援助任务有严格的纪律要求，没有传播国内文革消息的义务，没有观点分歧与派别争斗。即使收到家乡关于文革的传单或印刷品，都要如数上交党组织，不准相互传看，不准传播小道消息，否则就是违纪，要受到纪律处分。我们这些在越战前线的年青的战士，思想是非常单纯的，“一切行动听指挥”又是军人的天职，因此，出国部队对国内“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知之甚少。二是援越抗美部队出生入死、屡建战功，与我国云南边界一江之隔的越战形势正处于激烈而艰苦的关键阶段，从战场上下来经历过战争洗礼的军人让人刮目相看，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充满着赞扬、敬佩之情，我们所到之处受到的隆重欢迎与盛情接待就充分说明这点。即使这样，我们在玉溪休整期间也不是在真空中生活，还是要面对当地“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与群众运动的现实。尽管我们严格执行不参加、不表态、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规定，但是，两派群众组织千方百计接近我们，都想借助我们的威望炫耀自己，依靠我们的力量制约对方。我部领导机关始终头脑清醒，不被各派活动所左右，不偏不倚，坚决恪守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原则。但是，不参加也可能被迫介入。

这次武斗的起因我已记不清了。印象中过程是这样的：有一天，一批丧魂落魄的群众跑到我们指挥部司令部、政治部机关大院，强行要求“避难”，声称有人要抓他们、打他们、杀他们（避难者可能是力量单薄被打败的一派）。另一派众多群众在造反派头头的指挥下，气势汹汹地冲进来要抓要打，甚至还有人扬言要冲击我军指挥部大楼，说我们“窝藏”反革命、叛徒、地主、资本家和坏分子。支队首长命令机关人员在上级没有明确指示之前，尽量说服群众不要武斗，不准抓人打人，不要冲击我军指挥部机关。我们机关人员用身体围成一圈，把两派群众隔离开来。即使这样，一会儿有人冲过来指着张三为“反革命”，一会儿有人挤进来指认李四为“地主”，一会儿又有人大喊王五、赵六是“坏分子”。凡是围坐在大院地上的几十号人，都被指控为地、富、反、坏、右。

我们感到很奇怪也很纳闷：这么多坏人还敢明目张胆地跑到我们的指挥部机关要求保护？

同样一个自发的革命群众组织哪有这么多坏人？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起码也是夸大其词。我们这些年青的战士在战场上有鲜明的标志辨别敌我，而在国内群众中却很难识别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当然，群众中的绝大多数是好人，坏人只是极少数。我们就抱着这个道理，任凭别有用心的人煽风点火，造谣生事，挑拨离间，或是采取软硬兼施、轮番进攻的战术，或相互对骂、上纲上线，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大家手挽着手，坚守“阵地”，不让“防线”突破，不使两派刀棍相碰、身体接触。

在谩骂、吵闹声一片杂乱的状态下，在时起时伏的拥挤推搡中，我和战友们紧紧地手挽着手，前后左右移动着步子，及时调整方位，非常吃力地维持秩序。这比在战场上对敌斗争还要困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阶级兄弟”、自己的同志，是军民鱼水关系。我们只能听着、忍着，极力好言劝说，抵挡一阵阵“冲击波”，平息一阵阵的骚动。大约相持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上级下达了处置事件的3点指示，我们才从艰难的维持中解脱出来，战友们为控制混乱的局面没有进一步扩大而松了口气。

接到上级的指示后，我部一方面立即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反复播放上级指示；另一方面调回一部分兵力保卫指挥部机关，就近拉出整编团的指战员全副武装列队戒严设卡，使用重型军用车队牵引拖拉轻重武器围城造势，震慑造反派之间的派别争斗，收缴武器和械具。一场已经展开的两派武斗，就这样被我们所采取的措施平息下去，没有酿成群众之间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后来群众反映：出国部队不偏不倚，控制局面的能力很强，没有让事态进一步扩大。有的说：“解放军忍耐性好，什么激将法都无济于事，始终坚守岗位维持秩序。”有的说：“当时都被出国部队的阵势吓坏了、镇住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也有的说：“援越抗美部队是在越战打红眼的，不能和他们对着干。”“现代化装备的美国佬都怕他们，何况我们这些长矛短剑。”甚至有的人指着我部的轻重武器惊奇地说：“好家伙！好厉害！好威风！”还有人传说，我部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站在指挥部大楼前，面对十分激动的造反派大声怒斥：“谁敢冲击指挥部！”他的凛然正气使杂乱的阵势立即安静下来，没有人再敢往前跨进一步。这位将军，就是经历过各个革命时期战争考验的、屡建战功并几次境外参战的我们的支队首长。

这次“军事行动”，主要是宣传上级的指示，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维护社会秩序，防止群众械斗的事态扩大，没有任何激化矛盾的言语和行动。在较短时间里平息了已经开始的众多群众参与的内乱，有效地制止了一场较大规模的武斗，促使两派之间在不长的时间里达成联合。

休整期间，正逢玉溪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这是在经过“群众运动”、各级党政机构几乎瘫痪、无序的状态下“新生”的政权，因此也是震荡玉溪城乡的又一件大事。我受地方之邀，在玉溪专区商业局的一位摄影爱好者的配合下，拍摄了成立大会的盛况。那一天，玉溪地区数万名群众早早地集聚在一起，几条街道和一块宽阔的广场上坐满了人，各单位、各团体都打着横幅、标语，数不清的彩旗到处可见，场面极其壮观。在成立大会上，高音喇叭里连续不断播放革命歌曲，时起时伏的口号声响成一片，人人手中都挥舞着《毛主席语录》，各地纷纷发来了贺信、贺电，各界代表上台发言慷慨激昂，大会还给毛主席、党中央发了致敬电。我爬到一个高高的脚手架上，对着下面挤坐着的人群拍照，记录这数万人大会的场面。随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我跟随游行队伍拍摄了当时的场景。

我们指挥部机关结束休整开赴前线、告别玉溪，大约是在1968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之间，准确的日期我已记不清了。然而，部队撤离玉溪开赴援老抗美前线那一天的情景，我仍然记忆清晰。我担负拍摄当地党政军组织和人民群众热烈欢送我部指战员奔赴前线的历史性场景。

那一天我起得特别早，身背135、120两部老式照相机和笨重的101闪光灯，坐上一辆专门拍照用的军用三轮摩托，来回穿梭抓拍群众场面和感人镜头。天刚蒙蒙亮，指挥部机关和各部队指战员离开营房整队出发，欢送队伍的军乐声、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以及群众的欢呼声连成一片。玉溪人民恋恋不舍地送别“最可爱的人”，指战员们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饱含深情厚谊，挺胸阔步走在夹道欢送的队伍里。人民群众的真挚情感，就好像回到了战争年代老百姓热爱子弟兵那样情真意切，充分体现了军民鱼水关系。这种关系在那个年代是发自内心的、可贵的，也是我今生今世难以忘怀的。

□ 《文史精华》2007年第8期

~~~~~  
【往事如烟】

目睹文革揪出田汉、贺敬之一幕

• 准 星 •

文革开始的那年，我是北京的一个中学生。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目睹了全国文联机关首次遭受中学生冲击的情景。

我念书的中学与邻居小梅就读的北京女12中（现166中学），有一点明显不同的是，我们是平民子弟的普通中学，少有干部子弟。而小梅她们学校干部子弟大把抓。中央各部委头头、驻外大使、各军兵种首长、北京市委头头……的子女各班里都有好几个，总让人感觉，我们学校虽然也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人家那类学校是在造就国家栋梁。

文革中按出身论、血统论行事，可干部子弟更享有特权。他们有上层内部消息，敢想、敢说、敢干，各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基本都是他们贴出来的，他们自然成了文革刚开始，红卫兵组织正式成立前，学生造反的带头人，也就是后来变成红卫兵骨干的那群学生。

停课闹革命了，同学们天天写大字报，揭批校领导和老师。那天我实在无聊，从学校里溜出来，在灯市口大街上闲逛。看见一队女生由东向西走来，小梅在队尾，问她干什么去？她说去文联大楼造反。征得她同意我也混在队里跟着走。

老舍先生时任主席的全国文联机关，位于灯市口大街的西口，王府井大街的北头。我们一伙人走到文联大门口，被传达室里出来的人拦住了，问找谁？领头的学生说：“这里的当权派是谁，我们就找谁！”传达室的人又问，你们想干什么？学生中有人嚷道：“别跟他罗嗦，咱们进去自己找！”之后几十号人就往楼里闯。

楼道里宽敞干净，安安静静的，各办公室关着门。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两边的墙壁白白净净的，与学校里贴满了大字报、标语的墙壁相比那么不同。前面的学生一个接一个地撞开了房门，同时向里面喊话：“谁是这里的头？”各房间里的人都吓呆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有人回答，这里是全国文联，有不同的行当系统，具体是找作协的？音协的？美协的？领头的学生喝斥道：“少费话，找大当权派！”他们当中有人指点去哪层楼某号房间找找看。

我随一组学生进了一间大办公室。一张写字台前，端坐着一位长者，见有人进来，他抬起头来。为首的学生问：“你是这里的负责人吗？”那人答：“我不是总负责人。”学生问：“那你是干什么的？”那人答：“我是戏剧家协会的。”学生问：“你叫什么？”那人答：“田汉。”学生

群中一片哗然。问话的学生厉声说：“你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黑帮头子？站起来！”田汉站了起来。我的印象里，田汉体格高大，略有点儿胖。那学生骂道：“瞧你这副养尊处优的猪像！交代你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田汉惊愕的看着面前的学生无言。几个学生齐声怒吼：“老实交代！”田汉说：“原《义勇军进行曲》，

现在的国歌歌词是我写的。”问话的学生一时语塞，不知道该接什么话头好，另外几个学生赶紧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田汉！”这才一时解了围。

只见刚才被噎的学生抄起地上的一个藤条编的垃圾篓，窜到田汉身后的椅子上，一扬手把藤篓扣在田汉的头上，篓里的垃圾、纸片、碎屑顺着田汉的头往下掉。田汉两手拚命往上推藤篓，想把头挣脱出来，后面站在椅子上的学生双手使劲往下拍。那藤篓带有锥度，口大底小，下到一半就下不去了，只见往下拍的双掌握成了双拳，像抡刀斧一样往下砸。随着藤篓的变形和破裂声，有丝丝的血迹渗出来，淌到田汉的短袖白衬衫上。

后来我在小报上看到，田汉先生于1968年12月背着叛徒特务的罪名，惨死在301医院。当时对于田汉先生的野蛮批斗，小梅不以为然，她说，我们学校的校长、老师早就被割了阴阳头了，这算不了什么。

后来我看热闹的心没有了，想赶紧离开。在往外走的时候，听见了另一间办公室里的对话，问：“你叫什么？”答：“贺敬之。”这个名字让我站住了。我从语文课本里读过他写的诗，至今还能朗朗上口。又听见问：“什么出身？”答：“贫雇农。”女孩尖细的喝斥声：“蜕化变质分子！”我还是忍不住想看看我崇拜的诗人是什么模样，又退回到这间办公室门口。

只见一位40岁上下的男子站在办公桌旁，脸庞黝黑，一头浓密的黑发。天蓝色的长袖衬衫掖在西装裤内，腰间的皮带很惹眼。那个年代里，成年男士用腰带把裤子系在上衣的外面还不多见，那是洋人的着装穿法，谁要效仿，无疑是给自己脑门上贴了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标签。果然听见里面的学生吼：“瞧你这副打扮，就证明你已经彻底蜕化变质！”我害怕后面再发生刚才批斗田汉的场面，赶紧往外走，在楼道口从后面传来一声：“限令你24小时之内剃掉自己的油头，否则格杀无论！”

自这次冲击之后，这座大楼里就没有了安宁之日。机关内的造反派搭建了批斗台，文联内部知情的造反派提供钢鞭材料，外面进来的红卫兵主持批斗会，机关里的那些“牛鬼蛇神”轮番在上面受折磨。

后来听说了老舍先生自杀的消息，小梅说，她们学校的红卫兵直接参与了对老舍的批斗。她还说，没见过这么顽固的三反分子，又臭又硬，敢撕扯头上的高帽子，敢摘胸前的黑牌子。

直接亲手挥鞭凌辱老舍先生的那群红卫兵、基本都是“8·18”那天，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亲自接见并合影留念的“老兵”。他们赢得了至高无上的殊荣，获得了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特权，那种有恃无恐地狂妄，已经到了杀人不眨眼的地步。8月24日，老舍先生投湖自尽，正是北京最恐怖最血腥的那段日子。

当年给田汉先生头上扣纸篓的那批造反派和折磨老舍先生逼他跳湖的那群红卫兵，现在都已过了知天命之年，无论身处何方，境地如何，文革四十周年这个日子相信不会忘记。连我这个当年的“逍遥派”都做过一次又一次的恶梦，难道施暴者，施虐者、害人的打手，凶手，内心从未泛过什么波澜？

~~~~~  
【读史札记】

林彪研究最新成果：《林彪案件完整调查》

• 武宜三 •

作者提要：舒云在《林彪案件完整调查》提出了三十二问题：“毛为什么出尔反尔？”“汪东兴是个什么角色？”“为什么江腾蛟九月十三日就自首了，是不是苦肉计？”“林豆豆报告八三四一部队，为什么上边让林豆豆也上飞机？”“林彪手令是林彪写的吗？”“潘景寅是个好人。邓小平为什么这么说？”等等，每一个问题都包含着阴谋诡计、惊险刺激，每一个问题都引人入胜、都让人思考。林彪是反最后神权的英雄，林立果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时代思想解放的先锋：“老子英雄儿好汉”，竟宿命地应验在林家父子身上。

◇ 三十二个问题是解开林彪事件的金钥匙

林彪研究或叫“林学”，与“文革学”、“毛学”等一起成了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一门显学；最近由 明镜出版社出版的舒云《林彪案件完整调查》（以下简称《调查》，引用该书文字只标页码），则是“林学”的一项最新成果。由于中共对历史档案资料的垄断、封锁、篡改、伪造，以及中共长期坚持的“历史为政治服务”、“以论带史”的唯心史观的作祟，给包括林彪事件在内的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扰。这使得所有与中共有关的历史事件无不云遮雾罩、扑朔迷离；也就是说，在中共几十年历史，没有一件事是透明的而且是能说得清清楚楚的；也没有一句结论是让人信服的。荦荦大者如张国焘事件、项英事件、高饶事件、潘杨事件、李震事件、赵紫阳事件，等等。

九一三事件是林彪问题的关键，而九一三事件，用舒云的话来说，“事件本身，只有不到一天的时间”，但由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数据。而且当事人没有一个经历全过程”（p 20），也使之成为世上最难破解的一个迷团。《调查》作者舒云从一九八七年开始，花了近二十年时间，殚谋戮力，翻查了无数报刊、资料、档案，深入有关事发现场如庐山、山海关等，不殚其烦地采访了一百来个当事人、目击者甚至他们的亲属、子女、勤杂人员，获取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和照片，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凝结了作者心血的五十万文字和一百多幅珍贵照片，尤其她所提出的三十二个问题，对廓清迷雾、揭露事件真相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三十二个问题是全书的总纲，也是解开林彪事件的金钥匙；这些问题，都是舒云独立思考的结果；对于那些御用学者和人云亦云的主旋律派教授是不敢想象的。

◇ 毛为什么出尔反尔？

中共中央在《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中说：“林彪上了庐山，不去请示毛主席，在八月二十二日的常委会上，也没有表示要在大会上讲话。在事先没有向毛主席、党中央请示报告的情况下，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的会议上，第一个跳出来，发表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透谣言、欺骗同志的讲话。”然而，据舒云考证：毛不但事先知道林彪要发言，而且还同意林彪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毛为什么出尔反尔？这一切都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吗？”（p 23）

出尔反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毛泽东一生中不断表演的拿手好戏。一九四一年，毛动员全党“整顿三风”，摆出一副青年知识分子保护人的姿态，例如说“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宗派主义是排挤非党干部的一种风气，即排外主义。同时

也排内”云云（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结果王实味、丁玲们上当了，王实味还为此赔上了一条命。一九五七年，毛故技重施，先头也还叫“整风”，后来又改成叫“阴谋”。

一九六六年五月初，刘少奇、邓小平飞杭州向毛汇报文革形势后回北京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向各学校派遣工作组，并征得毛的同意；然而，七月十九日毛返京时却向刘等宣布：“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这次庐山会议，毛不过再次技痒而已。对“百团大战”是先肯定后否定；对抗日统一战线先颂扬后打击；在大量饿死人情况下，毛也被迫同意多分自留地、试搞“责任田”，但不久又翻案等等。这一切都是为了清除一切公开的或潜在的、甚至假想的反对派，以建立他永远独霸天下的绝对权威。毛始终都能钓到“大鱼”。

还有“汪东兴是个什么角色？”“为什么江腾蛟九月十三日就自首了，是不是苦肉计？”“林豆豆（把叶群、林立果挟持林彪上飞机）报告八三四一部队，为什么上边让林豆豆也上飞机？”“林彪手令是林彪写的吗？”“潘是寅是个好人。邓小平为什么这么说？”等等，每一个问题都包含着阴谋诡计、惊险刺激，每一个问题都引人入胜、都让人思考。

#### ◇ 谁放跑了林彪座机？

九月十二日二十一点二十分，周恩来得到叶群和林立果要挟持林彪出逃的报告。（p 5 1 8）二十二点四十分，周恩来听了一个“神秘电话”后，“天安门广场上彩排国庆游行的高音喇叭戛然而中止，准备国庆游行的群众队伍也提前解散了。”（p 5 1 8）二十三点三十五分，李作鹏打电话给山海关机场，不准任何飞机起飞。九月十三日零点六分，李作鹏再次打电话给山海关机场，不准任何飞机起飞。（p 5 4 1）零点过后，周恩来命令李德生立即去空军指挥所，代替他坐镇指挥，因为“林彪要乘飞机跑了”；同时派杨德中去西郊机场“协助”吴法宪。（p 5 2 6—5 2 7）周再一次让李作鹏打电话给山海关机场，不准任何飞机起飞。（p 5 4 1）

然而李作鹏却成了“放跑了林彪的座机”的罪人。为了反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没有采取任何阻止起飞的措施”的指控，李作鹏在特别法庭上作了四个半小时的陈述。（p 5 4 1—5 4 2）李作鹏问：林彪要起飞，我拦得住吗？既然是关系到副统帅，我也不知道他往苏联飞。周恩来都说“不能打呀，他是党的副主席”，毛泽东也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你们都没有办法，我怎么有办法？你周总理为什么不亲自打电话通知山海关机场？既然让我通知，为什么不告诉我事情的来龙去脉？如果命令警卫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队拦截，一百个林彪也走不成。为什么不命令？李作鹏强调：对我来说，问题的关键是林彪走对我有好处，还是不走对我有好处？不走他还是副统帅，我还可以大树底下好乘凉，放他走干嘛？（p 5 4 2）

可见李作鹏“放跑了林彪的座机”，纯是无稽之谈，是欲盖弥彰。所以“李作鹏在关押期间给周恩来写了三四封信，全都石沉大海。”（p 5 4 3）联想到毛泽东在事件前“抛石头”、“挖墙角”、“掺沙子”、“打草惊蛇”等一系列卑劣行径，事件后的“禁空令”、“拍手”、“高兴”、“喝茅台酒”（p 5 9 8—5 9 9），便不难想象谁是逼走和杀害林彪的刽子手了。

#### ◇ “我们故意说不可能”，为什么？

九月十三日零点三十二分，林彪的二五六号三叉戟升空；（p 7 0 2）时速五百公里，先向西南，十四分钟后右转弯，对着北京。在河北迁安上空，突然向北直飞。（p 5 2 8）飞过遵化时，五十六部雷达全部打开（p 5 2 9）。三十多分钟后，飞机从张家口一带进入内蒙古（p 5 2 0）。然而遵化在迁安东面，如在迁安向北，怎么会经过遵化呢？事实上，各当事人说法之间有很多矛盾。如空军雷达兵部部长傅英豪说，航图上基本上是“之”字形；北京军区作战部值



班参谋刘建林和空军指挥所作战值班参谋朱秉秀却说是“一条直线，一点弯也没有”，“一条特别直的直线”，直奔蒙古、乌兰巴托。（p 5 2 9）但不管怎么样，三叉戟受到严密注视的事实，却无法否定。

零点四十分，李德生进入空军指挥所，代表周恩来全权指挥。白云指着总空情标图板，不断向李德生讲解三叉戟的飞行动态和特点。李德生将雷达跟踪的飞机方位、角度等等情况用（直通周恩来和汪东兴的“红机子”保密）电话报告周恩来。（p 5 2 7—5 2 8）一点，周恩来亲自向十一个大军区和二十九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通报“林彪跑了”，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关闭全国所有机场；随后又据毛的指示，和叶剑英共同拟定紧急战备命令，向全军发布。（p 5 9 6）一点五十分，三叉戟飞出国境，高度二千五百米。（p 8 1 5）一点五十六分—二点二十分，传达毛泽东“禁空令”。（p 5 3 4）二点三十分，飞机目标失去。（p 8 1 5）二点三十分左右，周恩来命令吴德、吴忠：首都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派部队控制北京郊区几个机场，没有中央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和降落。（p 6 0 0—6 0 1）

五点多，技侦八团听到蒙古边防站的通话：温都尔汗有一架大型飞机失火掉下来，十八点四分，蒙古雷达团长向所属各连通报这一消息。（p 8 1 6—8 1 7）。凌晨，《美国之音》根据卫星观察，报导了中国三叉戟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上失事；随后，合众社、路透社、塔斯社的消息更指，中国武装部队飞机在蒙古坠毁，有九人死亡。（p 8 0 9）全世界都知道了的事情，偏偏当事国的人民、甚至高级干部都被蒙在鼓里。当蒙古外交部抗议中国侵犯其领空时，“我们故意说不可能”。（p 8 1 7）毛周一伙不但想愚弄中国人，还想愚弄外国人；自动放弃了第一时间赶去失事现场收集资料、了解失事机会的机会。半个月后，还不给”正式解释“；以至蒙方要在九月二十九日再次对中国“表示遗憾”（p 7 3 5）。

#### ◇ 为什么不找黑匣子？

飞机失事，首先就是要尽快找到黑匣子，这是事故调查的基本常识。可是“谁也不说，好像这架三叉戟上从来就没有黑匣子一样。”（p 8 3 6）这是为什么？这是毛周一伙在掩耳盗铃，企图隐瞒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中蒙关系虽因文革而恶化，但在一九七一年已经好转，中国驻蒙大使许文益已于八月二十日到乌兰巴托履任。中国在九月十三日确知飞机坠毁，特别是《美国之音》等媒体报导之后，就应按国际惯例，光明正大地通过外交运作，要求派遣专家组到温都尔汗作现场调查勘察，既可以及时查找失事原因，也可以收回被带走的数据和财产，同时运回遇难者的尸体，既保住了党国机密又捍卫了国家主权。

飞机事故调查组应由机务、飞行、领航、调度以及空军的有关人员组成；为了保证可靠性和可信性，必要在最短内赶到现场；甚至有必要请飞行数据记录器、飞行器制造厂家参与调查。然而，中方在得到蒙方口头抗议时，还在鬼鬼祟祟、支吾搪塞，一再延误到现场视察的时间。一直拖至十五日十八点才达到现场，这时离失事时间已超过六十五个小时。在这六十五个小时中，苏联人、蒙古人至少已经两次搜索了事故现场。而且派去的全是外行：一个奉命唯谨的外交官僚、驻蒙大使许文益，二等秘书孙一先，翻译沈庆沂、王中远。中方虽然要求把“死难者遗体运回中国”和“将死难者的所有遗物交还我方”，但在蒙方要求“做出书面正式解释”的强硬态度下（p 7 2 1），毛周一伙为了“保住密”、“把引发战争的政治事件化解为一般的民航事件”，为了自欺欺人，只好不了了之，既没有坚持“要回尸骨”，也没有“要回遗物”。（p 7 2 2）离谱的是，毛周一伙居然不把起码的事实：死难者名单告诉去现场的调查人员，以至于墓碑也只能用“红色的阿拉伯数字”表示。独裁者对他的忠实鹰犬也是不信任的，不知现在仍为独裁体系当忠实走狗者作何感想！

舒云不无讽刺地写道：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做得最好的就是保密工作。（p 7 3 2）

中共中央严格封锁九一三事件，“北京市的范围内，只限于吴忠、吴德两人知道，不允许向任何人泄露”。（p 6 0 1）九月十八日传达到党内高级干部，九月二十八日扩大到地、师一级。（p 7 3 2）十月下旬传达到公社社员，而五七干校中的牛鬼蛇神直到十二月份才有分享这份的权利。（林牧：《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要保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方法》已不打自招：保密影响党的团结和社会安定；影响各级领导人和著名人物的个人形象、声誉。总之，保密关系到中共的合法性也即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是腐朽糜烂、血腥丑恶、怙恶不悛的中共苟延残喘的救命稻草。

#### ◇ 老子英雄儿好汉

九一三事件是文革从盛转衰的拐点，是中国人民反思文革的起点，也是毛泽东神话彻底破产的关键。不管自不自愿，也不论成败，林彪在面临迫害的最后关头，用行动宣布了和毛泽东的公开决裂，与逆来顺受的高岗、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相比，林彪不失为最后的英雄。对《5 7 1 工程纪要》的产生、发现的过程以及与林彪的关系，舒云也作了大量调查，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但我以为，《5 7 1 工程纪要》并不因此失去作为中国人民启蒙教科书的经典价值。当共产党把《5 7 1 工程纪要》当作林立果的罪行大批特批的时候，无疑把“超天才”的桂冠确实实地戴到了林立果的头上。

《5 7 1 工程纪要》痛斥毛泽东“篡改、歪曲马列主义”，用革命的词藻“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以中国人民当作继续革命对象，实行“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的统治，“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是“当代的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p 4 0 5）所谓“打击一小撮”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批，各个击破。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今天甜言蜜语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他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的关压，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他是一个怀疑狂、症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p 4 0 9）

毛泽东与林彪从井冈山以来的同志、战友之情，师生、君臣之义，几十年患难之交、生死与共的关系一旦而毁，也为《5 7 1 工程纪要》提供了最新证据。尤其“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p 4 0 5 —— 4 0 6）对毛的“社会法西斯主义”本质作了入木三分的揭露，是后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如四五天安门事件、西单民主墙、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的先声。

至于“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更是后来赵紫阳、胡耀邦、邓小平实行开放改革的滥觞。林彪是反最后神权的英雄，林立果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时代思想解放的先锋：“老子英雄儿好汉”，竟宿命地应验在林家父子身上。

~~~~~  
【追忆前辈】

感受长者关怀，愧对前辈期待——纪念王年一先生

• 陈小雅 •

◇ 为纪念王年一先生逝世提出林彪遗体索还问题

本来，在今年的“九一三”这一天，我很想公开提出“林彪遗体归还”问题。

这个想法，产生于我研究林彪事件的过程。阅读有关史料时，我曾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耻辱感。首先是孙一先先生《在大漠那边》描述的林彪一行的下葬情况。当时，由于死者身体僵硬时的形状不一，有的盖不上棺盖，掘墓人不得不将死者手臂强行折断。孙一先曾清晰地听到手臂折断时发出的“咔嚓”声。还有澳大利亚记者汉娜姆的描述，苏联克格勃医生盗取林彪夫妇头颅后，带回苏联，并将之置入沸水中煮熟，然后剥去头皮，露出头骨，以验证头部枪伤……这些情节令我震惊，乃至呕吐！

不久前，我读萧军回忆录，他也曾眼见一群士兵以死人头颅当足球踢而愤慨而恶心。报载一则陈赓大将的往事，也提到他见一位士兵脚踢死去敌人的身体时责备的话：他已经死了，你为什么还要侮辱他？可见，对于死者尸体的尊重，是人的“类”的共同感情，是文明的标志。而侮辱死者身体，是可怜的人类不文明时代的陋习。由于本国历史的不幸，而使本国人的尸体遭致外人的侮辱，不能不是流有相同血液的我们“族”的耻辱。

我期望，在国际条件允许时，中国政府能够向苏联与蒙古政府提出索还林彪一行遗体的问题。这不仅将体现一个政府对本国人民生命的重视，也必将大大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文明与自信的形象，对于军队的团结、国家的安定更是有益无害之举。

我曾设想，在适当的时候，与王年一先生探讨此事的可行性。但王先生却不幸过早离开了我们。

◇ 林彪研究的困难所在

奠定王年一先生在文革研究界地位的《大动乱的年代》，我是在一出书时就读到过。当时，碍于对“文革”认识的肤浅，并不能完全看懂其中的“伏笔”。后来，在亲自研究“文革”及毛泽东问题时，我重读这本书，才感到作者在许多关键处给后人留下的空间。我感到，作为一位前辈，在他所处的环境下，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透过这些星星点点的提示，我看到了一位正直学者对于真相的执着，对于来者的期待。虽然当时我与王先生素不相识，但这预示着我们已经有一种精神的接触。后来，王年一先生告诉我，在读到《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行为及其心理分析》之前很久，他其实早已读到我的《八九民运史》。

2005年8月24日，《牛仔》出版不久，我就接到王年一先生一位朋友的来电，他转告我说，王先生说：“这是我极盼望的一本书，请向作者致敬意！”11月11日一位长辈告诉我，王年一对他谈到：“小雅这本书可以传世”。他说这本书特别值得称道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对“九八手令”中那个“盼”字，抓得很准；另一处是对军队干部子弟的描述，很到位。——这些评价，让我倍受鼓舞。

过去，我出书写文章，有时也送朋友，有时什么也不说，但这一次，因为这位长辈的鼓励，我访问了王年一先生。因明镜出版社很快就来信要我心理准备出第二版，所以，我向王年一

先生请求，能否为《牛仔》的第二版写一篇序？

王年一先生慨然应允，还建议我找李锐先生，请他重新题写书名。由于李先生经常不在，第二版也很快就印了出来，此事没有进行下去。

在那次访问中，王先生跟我谈到这项研究的许多困难。首先，在上世纪80年代，中顾委讨论《中共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有位老人提出，趁大家都在世，把林彪的案子澄清一下，邓当即表示反对，他说：“林彪的案不能翻，这是要林彪还是要党、要毛主席的问题。”

王年一先生说：“我们研究文革，澄清历史旧案的真相，就是要打破这种逻辑。”这是一种什么逻辑，王先生没有说。按我的理解，就是专制的逻辑。

王先生还告诉我，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在世时已经提出：既然大家都知道，当年给林彪定案，有许多东西是出于政治需要强加的罪名，那历史上总是要翻过来的，与其让后人翻，不如在我们手里说清楚就好。但老邓说，还是要“从政治上看问题”。

如此说来，胡耀邦与邓小平的差别：一个是“从历史角度看问题”，一个是“从政治角度看问题”，性格鲜明，眼光各异，孰长？孰短？从不同的角度和专业出发，也就自然会有不同的评论。

王年一说，我是搞历史的，当然从历史上考虑问题。

在研究毛和文革后历史的过程中，我也感到邓与林的关系不仅有政治的因素，还有个人因素。这个因素是毛种下的。因为毛在世时，党内高层和美国人都预测，毛的接班人可能在林和邓之间产生。毛也一直用邓来胁迫林彪就范，因此，邓也被林看作肘腋之患。文革中，一日不开除邓的党籍，林彪一日不得安心。而邓在林彪之后取得军队实权，对军内林系人马一直深怀忌惮，“六四”把三十八军推上“前线”，而同时又派各派人马从旁监督，就是暗含其长远忧虑的一个安排。

王先生不管政治，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就不会来“管”他。从2005年年初起，有关部门已经公开警告他的家人。王认为，这很可能与《重审林彪罪案》（明镜出版社）一书的出版有关。哈佛大学一直在邀请王先生访问，但碍于军队纪律，他既不能出国，也不能在境外发表文章。而林彪案，与法轮功问题一样，是已经被“钦定”不能碰的。

#### ◇ 愧对王先生的期待

在那次访问中，王年一先生谈到了“林彪案”研究中三位女性作者引人注目的事情。这三人一位是张聂尔，一位是舒云，一个是我。他表扬了丁东在国内民间文革研究中所发挥的组织作用，希望“林案”也有一位这样的学术组织者来担当。碍于对于本界的生疏，以及家事的拖累，我只能进行个人作业，当时就向王先生表示了自己的不可能。

以后，直至王年一先生去世，我们之间有过七次书信往还。王先生来信的日期分别是：2005年11月17日、11月23日、12月6日、12月12日；2006年1月5日、1月6日；2007年1月23日。其内容大多是给我以鼓励和建议，大到一个选题、一个人物，小到一个名词解释，一个用字，同时，他老人家还将手边随时看过的文章，随时想到的可以采访对象及其联系方式向我推荐。在在都体现了他对学术的追求完美的境界，对晚辈的一片拳拳爱护与扶持之心。同时，也寄托了许多他自己未竟的期望。他希望，他的学术生命，能够

在下一代中间得到延续。

如今重读这些信件，我对王年一先生除了感激之情外，就只有“惭愧”二字。这里面虽然有一些客观原因，但最主要的是因为我的懒惰，尤其是脑伤之后推卸责任的意识几乎占到主要的方面。我不敢保证我今后是否还能重振信心和激情，但我希望王先生能听到我的道歉。同时也请他老人家放宽眼量，寄希望于未来！

写在2007年9月15日王年一先生出殡时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丁凯文（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